



汪品先

海洋地质学家

1936年11月生，江苏苏州人。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

长期从事海洋微体古生物及古环境的研究，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微体化石埋藏学的研究，开拓和发展了古海洋学的研究。

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何梁何利基金奖等重大奖励多项。

现任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

汪品先教授曾于1999年作为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了国际大洋钻探船“决心号”在南海实施的ODP第184航次。这是中国海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

2001年起，汪品先教授开始担任973项目“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中的深海过程和深海记录”首席科学家。由他领导的项目组完成了三十多个实验项目的六万多次分析，对所取得的深海钻孔剖面样品开展了全面研究，率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学科组赢得了相当高的国际声誉。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同济百年
表杜甫句与同学共勉

汪品先

站在大洋两岸

汪品先

同学们，晚上好！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大雨之夜来给同学们做讲座。我讲的题目是“科学创新的文化背景”。这是一个当前对学校来说十分迫切的课题，因为我国领导人提出，2020年我国要建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这可是一个大而宏伟的目标。我们试想一个古老的国家，将重新焕发青春，进入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是非常值得兴奋的，这也将是你们这一代将要迎接和走过的日子。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投入了不少，但创新不够。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原因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客观上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条件慢慢好起来了，不过我今天要谈的主要是主观上的问题。主观上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是通常人们并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不怕有病，就怕不承认有病或者没发觉有病，等到病发的时候，一切就晚了。

我今天讲4个问题：第一，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第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交流的必要；第三，科学的创新是需要宽松的文化背景的。最后，就是大学的重要性。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许静华教授的退休演说，他是苏黎士

高级工学院——也就是爱因斯坦的母校的地质系主任。1994年他退休了，那时作了一个报告叫《为什么牛顿不是中国人？》这个报告很有意思。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许静华教授，他写过很多书，很多文章，包括很多已被翻译成中文的科普书，是世界上目前为止，中国在地球科学方面成就最高的、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教授。他问了一个很传统的问题：牛顿在1686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开始。为什么是英国的牛顿而不是中国的“马顿”开启了新的世纪呢？而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许静华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历史以及中国语言的特性不利于科学的创新和现代科学。首先，儒教的文化着重于解释传承前人的文化，而科学的进步需要我们对前人的文化进行证伪，这两者恰恰是相反的。另一方面，许静华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以书写为主体，而不是以发声为主体的。在统一了整个国家的同时，但又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为全国都用相同的语言和文字了。

这个深度的问题同样在李约瑟（中国科学院的名誉外籍院士）1964年的书籍中提到：为什么近代科学会在欧洲产生，而没有在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中产生呢？而他的正问题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间，在运用人类的自然知识和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近代科学的产生却没有在中国。这两个正反问题的提出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先前辉煌后来却落后了？李约瑟最著名的巨著就是百科全书——《中国科学

技术史》，其实还有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就是所谓的“大滴定”。李约瑟是一名化学家，所以他将社会科学从化学的角度来滴定一下，就是把各国的文化作为各种液体，而把科学的发现作为试剂，分别滴入各个液体，按照液体的不同反应来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判断一个国家的落后与先进。这本书就叫做《中西方科学与社会》，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而他对于这些难题的解释是：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存在着“抑制”因素——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国是封建官僚主义的，并且缺乏商人文化。所以从根本上说，他认为中国人不相信理论，而相信实际。例如，他认为中国的数学思想是应用式，代数式的，而西方是几何式的；中国的阴阳思想是波动式的，而西方是粒子式的，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李约瑟并没有看不起中国文化，他强烈主张中国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起源于中国东方文化，他把两者比喻为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到16世纪的时候，东方的文化超过西方的文化，东方的火车开的快；到最近的400年，西方的列车比东方快，东方的文化被遮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东方的这列火车能不能继续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西方这列火车有问题：它不能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所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那么东方的

火车是否能在以后开得更快？他认为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两列火车必然会结合在一起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然后再介绍一位教授，是一位日本琉球大学的教授，叫木川达雄，他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叫《寿司科学与汉堡科学》。在美国，他大为感慨，美国人做鱼的方式和日本人完全两样，他认为美国人吃炸出来的鱼其实吃的就是碳，而日本人虽然吃的是生鱼片，但是其中的营养十分丰富。他是一位很活泼的人，他还曾经写过《大象的时间与老鼠的时间》，大象和老鼠的身形以及寿命都相差太大，大象可以活几十甚至几百年，但老鼠的寿命只有几年。它们的心跳也不一样，老鼠要比大象快，呼吸的快慢也不一样，但是如果对它们呼吸次数的总和进行计算，会发现老鼠和大象的呼吸次数的总和是一样的。所以，他得出一个定律：不同动物的眼睛看时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老鼠所看到的时间和大象所看到的是不同的。当然，他从老鼠和大象的立场上看待时间这个问题时是有科学创新的意识的。当他看待这个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时，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主要在于宗教。在西方，主要是以基督教为代表，而在东方，主要是以佛教为代表。西方的宗教是单神论，只可以信仰上帝而不可以是其他的神；而在东方，是多神论，允许信仰众多的菩萨，允许众多规律的产生。在科学中，西方是以假设为导向的，而东方是以事实为导向的，这两者完全不同。东西方的

科学家也不一样，西方科学家注重个人，要和别人不一样，而且通过语言表达出不同性，而东方人讲究和谐，作为社会的一员，很多话不需要讲，只需让事实讲话。他举了个例子：西方人的夫妻每天都会说“my darling, I love you!”而东方人从没有这种习惯，只需一个微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所以他说，东方的科学重于技术，而西方的重于假设。

东西方文化差异历来是许多科学家讨论的话题。几百年来，中国很多真知灼见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这个问题谈论了很多，其中我要谈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任文政先生，他曾经是上海图书馆馆长，是一位很早就留日留美的化学家，他也特别谈到过东西方文化问题。我记得那年在海南开中国科协大会时，朱光昭就专门介绍了他，他的文章叫做《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没有归纳法是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一辈子很有成就，他谈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时，认为任何地理气候等都不是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哲学观。他说，儒家重于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的征服。大家所熟悉的梁启超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言论，我这里只引用其中

的一段，最大的阻碍是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所以，现在我用这些人的观点来回答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的原因就是：

1. 封建制度；
2. 大陆文化；
3. 方块文字；
4. 科举制度；
5. 思维差别；

这算是我今天的开场白，下面我就来具体的分析这些问题。这恰恰是我们闭关锁国，与外界交流最薄弱，比较单一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民族要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远见，坐井观天是不可能创新的。

首先来谈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是多么重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世界上著名的宗教都起源于亚洲。但是，现在文化的主题或者文化的标准是欧洲文化，美洲也是根据欧洲的。所以这里面的转折是很有意思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交流的问题。有这么个规律——文化交流繁荣的时候，科学，社会，经济也就发展的越快；而文化交流受到限制，或者闭关锁国的时候，科学发展必然落后。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好的证明：战国时期，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到了汉唐，国际间的交流也非常多，而为什么近期的400年来，中国却退后了呢？这恰恰是我们闭关锁国，与外界交流最薄弱，比较单一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民族要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远见，坐井观天是不可

能创新的。一个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人也是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可以回忆到解放前或是文革的时候，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很好的例子：阿Q进城之后，大开眼界，认为城里人很荒唐，把条凳叫成长凳，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毛病，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英国，发现邮筒都是红的，我小时候看到的都是绿的，怎么可以是红的？红的是救火的。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屋的同学学的都是法文，他认为法国人特别混账，他认为书应该是女的是阴性的，为什么法国人的书认为是男的阳性的？如果放眼世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星期的叫法，我们都是说星期一，星期二的，但是欧洲人和日本一样，用星座来命名。不仅星期不一样，连月份都是不一样的。凯撒大帝以前，第一个月份是三月，后来加了两个月，所以把所有的月份都往后推了，如果我们去看词根会发现September是七的意思，那怎么变成了九月呢？我们还发现October代表八，但是实际我们都认为是十月。后面的November，December以此类推。其中的原因是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和他儿子奥古斯丁（August Caesar）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七、八月，并且都是大月。

这类事情不仅在国外有，在中国也

有。中国人把农历叫做夏历，是因为和年代有关，我们现在沿袭的就是夏朝的日历。夏朝将寅作为正月，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周历建子，秦历建亥。自汉武帝改用夏历以来，沿用至今。我举这么多的例子就是要说明：不要把古来至今的一贯理念都认为是对的，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国外不一定如此，当今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古代不一定如此。也就是说，你有了一定的眼光后，才会有创造性。

现在我们来看看世界文明的起源，一个是以爱琴海为代表的希腊文明，一个是以尼罗河为代表的埃及文明，一个是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还有两个就是印度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其中的四个是来自于河流的，而唯独希腊文明是来自于海上的，我认为这就导致了以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爱琴海周围都是岛屿，遍布周围，所以希腊的航海业十分发达。埃及在尼罗河上，如果没有尼罗河就不会有埃及。3000多年来法老文化一直保持不变，后来被罗马打败，最后成为阿拉伯国家。两河流域本来是索米文化，后来变成巴比伦文化，当时其文化非常先进，最早的文字也是出于此文化。

其实现在的很多文明都是很多国家的古文明交织结合在一起的，而中国总是说我国的文明是独立的，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的外来文化。我们中国的水果都是小的，那些大的水果都是国外引进的。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外来的文化中国化，这

一点非常伟大。在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就有汉奸的现象，不管什么国家占领中国什么地方，最后都会被同化，变成中国人了。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有两种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个是佛教，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你们看，它们到中国之后都变了。甚至世界上最顽固的文化——犹太人文化，2000多年以后，在以色列仍然能建立出犹太国家，在美国生活的犹太人仍旧保持他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到了中国，他们就被中国同化了。早在北宋时期，有一批犹太人到了开封，现在就没有了，变成中国人了。中国文化还受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您”、“胡同”都是蒙古话，“打发”、“跟前”、“巴不得”都是满语，更有人说《红楼梦》是七分满语三分汉语，你信不信呢？佛教的梵文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菩萨”、“夜叉”、“劫数”、“浮图”等都是来自梵文。包括屈原的《离骚》也是从苗族歌曲中来的，还有有名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来自于鲜卑语。鲜卑语是北朝中最伟大的一位皇帝孝文帝将鲜卑族的语言与中国的文化统一起来了，而且他也大大推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同化。他规定任何人都不能穿自己的服装，都要穿汉族的服装；30岁以上的鲜卑官上朝一定要讲汉语；死了

的鲜卑人都不能埋葬在自己的老家；把鲜卑贵族的姓都改为汉姓。其实，汉人穿裤子的习惯也是从游牧民族中沿袭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华夏文明就是一个文明的融合体，她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我曾经和一位美国教授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打仗的”，那位教授大为惊奇：“那你们中国人是打什么仗的？”在中国，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多教可以并存。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汉唐盛世的时候，中国的首都一直是最繁荣的城市，当时唐朝的长安盛世空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者纷纷前来取经。再看看丝绸之路，是中外交往的渠道，但是真正从商的人并不是汉族，不是胡人就是西域人，虽然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但是他们也为中华民族带来了西域的文化。其中唐朝的跳舞和音乐是特别值得提倡的，有人说唐诗为什么好听，就是在唐朝之前引进了佛教，佛教中的音节也同时引入成为唐诗的音乐，然后就是西域的舞蹈，唐朝的诗人元稹写过一首诗“自从胡骑起烟尘……女为胡妇学胡装，使进胡音为胡乐。”可见，胡人舞蹈对当时文化的影响。我还想说的是印度文化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印度有三大神，其中有一个是猴神哈努曼，其实他就是孙悟空的原型，所以显然吴承恩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而把印度文化中国化了而写出了《西游记》。

我要讲的主题还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文化主要还是西方的希腊爱琴海文化，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华夏文化与希腊的爱琴海文化

相比，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海的一个是陆的，希腊文化基本上是海洋文化，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大陆文化。希腊周围都是岛屿，所以欧洲最早的城市产生在哪里？不是伦敦，不是巴黎，而是在希腊的一个岛上建立起来的。后来在欧洲地区，十字军东征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所以在那段时间，欧洲文化的交流也十分频繁。而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是离他们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从宗教到战争都是很离奇的。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会发现有很多关于海洋的故事，比如《诺亚方舟》，《出埃及记》，《海上风暴》等等都是和海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欧洲的海洋文化的氛围是很浓郁的。我们所熟悉的特洛伊的木马之战，就在土耳其，其实在木马之战之前，完全是海战。但是，当13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到了中国，他惊讶不已：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发达的国度，简直不可思议。也就是说，这时候中国文明还是比西方文明要先进得多。而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从文艺复兴开始。

中世纪后，14到16世纪，整个世界的进程改变了。我们要注意：“复兴”两个字并不是改革的意思，而是指中世

纪结束，将古罗马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文明带来，所以这种文明本身就展示了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由于文艺复兴先在意大利，之后带入德国，然后转变整个欧洲，将整个欧洲的文化与科技带动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将英国的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的根基是扎根于多样的文化中的，因此才出现了根盛叶茂的情况。这样就能解释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了。他是历史的必然，他是文艺复兴在学术界的反映，牛顿是17世纪的创造，而文艺复兴在16世纪就完成了。而中国呢？中国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就与海洋隔绝，直到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将我们打醒。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壮举。当时他船队的人数，吨位，时间都要比哥伦布强的多，而且比哥伦布早90年，而为什么发现新大陆，改变世界轨迹的是哥伦布，不是郑和呢？这原因也在于我们文化不一样。英国一位潜艇舰长写了一本书叫《A421中国发现世界》，其中文版也有了，轰动了世界。他的想法是从美国的地图上看，最先发现新大陆的应该是郑和，当然他的推想是空想，我也不相信。

但是由于文明的不同，虽然我们技术发达，但我们不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黄河流域文明和希腊的欧洲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一个是海洋文明，一个是农业文明。这种差别在15世纪以前，没什么差别，但是到了15世纪中期，明朝否定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将他的文献全部烧掉，而

这个时候，恰恰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这就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中国还在为此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有你也有我。我们说农耕文化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它有它的特点。我们知道农耕文化是要地的，所以“父母在，不远行”是我们的训言。所以明唐时期，有些皇帝就认为我们只要住在黄河流域就够了，周围偏远的地区并不需要扩张，留给那些蛮人吧。这就带来了两种文明的差别，海洋文明是外向型的，大陆文明是内向型的；海洋文明扩张冒险，大陆文明求稳保守；海洋文明崇尚个人奋斗，而大陆文明崇尚尊敬长辈。所以中国人都经常问：你吃饭了没？你去哪里？而外国人就认为你是在干涉我的个人生活。

其实，西方科学到我们中国并不晚，很早来过，是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以后的几百年中，也出现过很多机会，我们都放弃了。最早的应该是意大利的利玛窦，他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用学术的方式来传教的。和他对应的是徐光启，也就是现在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祖先，徐光启中举之后去北京，在南京结识了利玛窦，然后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兴趣，之后入教取名保罗，进入仕途之后，业余时间和利玛窦一起研究西方科学并且翻译了一部分几何原本，但是这些书到了清朝才正式出版。根据历史，徐光启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

年代要比牛顿早了80多年，如果当时中国就普及自然科学，也许牛顿就是中国人？后来到了17世纪晚期18世纪初期，也就是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很能干，当时俄国的皇帝是彼得大帝，都是很有作为的皇帝。而康熙当时扩张了新疆，而彼得大帝开展了海洋通道。到了19世纪，光绪皇帝要改革，但是改革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回顾以往的历史时发现，往往积极文化交流的时期科学进步，而闭关的时候却落后失败。

我会比较简单地讲后面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创新需要宽松的文化背景。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文化追求，它不应该像现在一样被视为一种交易和投机。另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应该三位一体，不能独立。科学家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高度对于科学创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曾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很好地论断，这样科学才能得到重视，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的另一面，科学还是一种文化，如果你仅仅认为是一种生产力或者是机器，那就错了。所以，科学家是科学的探索者，发现者，而不是写论文的机器。科学论文是科学研究的脚印，其中的少数日后可以成为里程碑，但并不是兑换金钱的票据和日后爬上更高位置的敲门砖。如果我们回忆以前的科学家，我们会看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钻研科学，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很多有重大发现的科学家，在他们在世的时候不是家财万贯也没有当官，大部分人一生潦倒，过世后才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西方，很多的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也有科学的兴趣和头脑，所以我说这三位应该是一体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公元前4世纪最有名的一个大帝，他做了很多海洋的探险；弗兰克林不仅是科学家，发明了电，同时也画了第一张墨西哥湾海洋地图。我喜欢把两位画家作比较，唐伯虎和达芬奇，两位都是同时期的。唐伯虎的山水画，仕女图都是中国的极品，但他不搞科学；达芬奇不仅画画，还喜欢科学，比如他画的洪水，就有水力学的影子，他画的人腿和马腿，有解剖学的基础，而中国是徐悲鸿以后才把马画对的。所以我说，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文化追求，很难在文化压抑的条件下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相互融合，是科学创新的最佳土壤。清朝时候实行文字狱，很难想象科学有什么发展。西方很多人曾想过，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会成为专制独裁，人人受到压抑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有创新的。很多科学技术的研究是来自于科学家的好奇心，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强调国家需求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重视是不够的。过分重视物质刺激，那么长久以这样的方式研究科学，恐怕最后的结果并不是科学创新，而是别的。我这里想举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例子，杨振宁是研究物理的，

所以他对物体的对称很敏感，他用文学来表达物理的思维，就发现了苏东坡的回文诗，还有巴赫的小提琴二重奏，也是完全对称的。这是非常妙的，而杨振宁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物理的对称性。李政道发现中国最早讲物理的人是谁呢？是杜甫。在杜甫的诗里写道：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李政道认为做物理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细和推。“细”就是要做实验，而“推”表示要做推理。我想说这些就是为了说明科学是需要文化背景的，科学家是要有文化素养的，而不是追名逐利的。

最后，我想讲建设创新型新社会需要创新型大学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要在2020年建设成为创新型社会，这些人才就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创新思想要从大学生开始培养，否则在2020年创建出创新型社会是不可能的。

中西方的大学又是不一样的，中国正式开始办学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叫太学。在西汉末年，太学的学生已经有1万多人。太学在中国的历史中有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的教学是从教会开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牛津，剑桥都从教会演变而来的。但是如何理解西方教学的优势是我们下面的任务。

要发挥大学的长处有两个条件：一个要稳定，另一个要有特色。每个大学都一个样不是大学的创新之路。有一个台湾教授曾经谈起说，剑桥和牛津有什么区别？他用了两

句话：Oxford teach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我们现在大学的学术建设上有两个大的问题，体制上，我们是盲目崇拜学校的应试教育；意识上，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不利因素和近几十年来我们教育上建立的阴影也一直影响我们。如果这些东西不去除，我们很难去创新。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和院士制度中都有这类问题，应试教育本身就是创新教育的对立面，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对前人思维的重复。院士问题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尊重院士，这是我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把院士的定位定得太高，炒作过分，那么这就是盲目崇拜。这是一种旧观念在新时代的复发。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看，我们华夏文明中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问题是，我们要分析什么是缺点什么是优点。有些缺点是我们历来就存在的，有些是我们近年来发现的，最可怕的是我们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的，而这恰恰是我们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关键。我认为最可怕的是有了病却不承认有病。

比如说，我们什么事都想搞运动，我们通过运动搞建设，通过运动搞研究。我们全国大范围的办学，连校训都很相似。比如，有些学校叫“求实团结”，那肯定有些学校叫“团结求实”。科

学是追求真理的，而真理只能是朴素的。现在是虚字当头，套话连篇，这种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创新型社会的土壤？这次的政协会上，王荫（原来的文化部长）作了一次发言，他主张讲自己的话，不要讲别人的话。而我们现在社会上最缺乏朴实无华的人才。很多杂志的主编都是挂名的，巴金死了以后还是《收获》的主编。很多老师讲课，讲的内容是不是你们所相信的东西？现在报纸的报道哪些是出了钱的，哪些是没出钱的很难分辨。现在很多评审团只会说好话，不会说不足。这样的会是一个创新型社会吗？科学创新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我们中国文化是崇尚圣言的，但现在已经到了妨碍创新的程度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科技体制中仍然有旧时代科举制度的影子。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是让学生为圣人立言，现在阻碍创新思维的根基还在。我们迷信权威，迷信领导。上海是现代科学的发祥地，洋务运动时，77%的书出自上海。所以，我认为上海在创造创新型社会，在科学创新中负有先行者的责任。（完）